

制度变革的民情分析

ZHIDUBIANGEGEDEMINQINGFENXI

雷恒军 吴国源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NORTHWEST UNIVERSITY PRESS

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制度变革的民情分析

雷恒军 吴国源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制度变革的民情分析 / 雷恒军, 吴国源著. —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6. 8

ISBN 7-5604-2197-0

I. 制... II. ①雷... ②吴... III. 政治制度—历史
—研究—世界 IV. D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8064 号

制度变革的民情分析

雷恒军 吴国源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太白北路 229 号 邮编 710069 电话 8830259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向阳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75 印张 219 千字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604-2197-0/D·183

定价: 23.00 元

导言

——民情概述

制度创新可能是当前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制度创新作为一种创新活动,它本身是基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但是要使这种客观需要变成一种现实活动,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就如社会规律要发生作用一样,它本身需要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环境来支持它,姑且将这种支撑制度创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称为民情传统或民情基础。在古今中外的制度变迁历程中,总能看到民情传统对制度创新活动有形或无形的巨大影响力,根深蒂固的民情传统可能会使一种先进的思想理论、一种公认的优越制度在实践中变得面目全非。

1911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大清帝国寿终正寝,新的政治体制——民主共和国第一次出现在东方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中华民国”的成立正式宣告了在中国已经延续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中国人终于走出传统上改朝换代的恶性循环。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之后,满腔热情地准备将其多年来深思熟虑的政治纲领——三民主义付诸实施。在他任

职的几个内,南京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力图在中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推行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些政策法令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孙中山无疑是一个最浪漫的革命家,他满怀信心地想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再造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和西方式的繁荣。但是,当时临时政府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使孙中山政府所颁布的绝大多数政令或法令成为一纸空文,孙中山被迫步步退让,最后不得不将新生的共和国政权交给袁世凯。为了限制和约束袁世凯,防范他日后专断独裁,孙中山在去职之前提出了定都南京、新总统必须到南京就职并遵守会议院所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项条件,申明他将在新总统到南京就职后正式辞职。但是,孙中山的最后努力也一一宣告失败,中华民国的民主共和体制终于被袁世凯“改造”得面目全非。最后,袁世凯连这共和政体的形式也不要了,干脆自己称帝,中华民国已被形、神俱毁。孙中山则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向这个自己亲手缔造的“共和国”宣战——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而且是屡战屡败。袁世凯死后,中国的政局陷入更加动荡的军阀混战之中,宪法、国会完全成为军阀政客手中随意摆弄的玩物,西方民主共和制度在中国的第一次实践以彻底失败告终。西方先进的民主共和制度在中国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从此以后,许许多多的中国政治家、思想家开始怀疑甚至否定西方民主制度的进步性。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机和实现国家富强,在思想领域进行了脱胎换骨式的观念转变,在政治领域则实施了翻天覆地式的制度变革。一方面,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使得中国的思想家与政治家不断地向西方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体制中寻求解法问题的良方,自由主义等西方思想理论先后传入中国,缘自

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民主共和制度也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轮番亮相。经过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的洗礼,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来自西方社会的东西,如西方式的科学体制、西方式的教育体制、西方式的政治体制、西方式的意识形态乃至西方式的生活方式等等。但是,西方式的“奇迹”并没有在中国出现。20 世纪初期,中国数次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但大多以中国式的专制终结。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力使得中国的思想家和政治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向传统回归。在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有形的专制制度已被彻底地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是,根植于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无形的专制意识却使西方民主制度在中国的实践最终异化为与民主格格不入的个人专制,成为阻挠近代中国实现制度变革的最大障碍,而且是不易觉察的无形障碍。

二

无数的历史事件和社会现实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同一国家或民族的不同历史阶段,虽然政治、经济、法律等体制完全不同甚至对立,但同样的民情传统使表面上截然不同的政治体制在实质上却表现出惊人的相似,同样的政治或经济制度在不同民情传统的国家中实施可能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结局。

那么,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民情”是指什么呢?“民情”一词在学术界的使用频率并不高,学术界一般用“文化”“传统”“国情”“民俗”和“中国特色”等词汇表述笔者所指的“民情”,在我们对“民情”给出一个确凿定义之前,有必要了解学术界同仁对以上术语的概念解释及范围界定。

“文化”:这一词汇很早就见于中国古籍,但其是指封建王朝的“文治教化”,与“武功”相对而言,它和我们现在所用的文化一

词虽有一定关联,但实际含义相去甚远。现在通行的文化一词实为外来语的意译,它相当于英语中的 Culture 和德语中的 Kultur。德语 Kultur 本义指精神文化,实指宗教文化;英语 Culture 的意义则与政治、法律、经济、教育等社会生活相关。文化作为学术用语,最早见于英国人泰勒 1865 年所著的《文明的早期历史与发展之研究》,六年后他在著名的《原始文化》一书中作为中心概念对之作系统的阐释,“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在他看来,文化是一个综合体,不仅包括知识、信仰等精神生活现象,还应包括人们从社会生活中获得的能力和习惯等等。这个关于文化的基础性定义提出后,对学术界产生过重大影响,至今仍受到人们的重视,被许多著作所引述。泰勒之后,学者们对“文化”的定义虽然众说纷纭,据说有 160 种以上,但大体不出广义与狭义这两种说法,狭义指社会意识形态、精神文化,广义则认为“可以包括人的一切生活方式和为满足这些方式所创造的事事物物,以及基于这些方式所形成的心理和行为”。^①

“传统”:传统是什么?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细究其义,恐属混沌。“传统”在现代意义上是英文 tradition 的汉译,是指由历史沿袭来的、具有一定特色的文化、思想、道德、风俗、心态、艺术、制度等,是一个外延最宽,反映客观事物最一般规定性的概念。从民族学的意义上看,世界各个民族各有其传统,它包含着各民族的文化、思想、思维方式、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心理素质传统以

① 刘守华主编.文化学通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1~4

及文字传统等要素。张立文等人在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一书中又将“传统”的内涵细分为价值观念系统、精神状态系统、知识系统和语言符号系统,这四个方面相依不离、相分不杂。价值观念系统的主体是进行传统活动的大众。传统的价值观念是由自然的价值观念、社会的价值观念、人自身的价值观念以及历史的价值观念等组成的多层次复杂系统,比较其他传统要素,它是传统系统、传统场的核心,并以传统主体的价值指向及其差异,区别和评价不同的传统结构模式;传统的精神心态表现为传统主体的精神气质,它包括人们的心理结构特征,对知、情、意的态度;传统的知识系统包括经验型和理论型的知识,是传统所不能缺少的部分;传统的语言符号系统,是传统的价值观念系统和精神心态系统的外部表现。不同的语言符号(文字),是不同民族精神的表现。它是传统形成的参与者,是传统创造的必要条件之一。^①

“国情”:顾名思义,是指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人口、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宗教、语言文字、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等等的基本情况及特点,也是一个国家特定历史时期的基本情况和特点的整体反映。当代国情是丰富的社会史和自然史长期沉积的产物,是具有多种层次结构、多种系统结构的复合体。中国历史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典型性和特殊性,因此,国情变化发展的过愆也表现了复杂性与多层次的状况,而且,我们对国情的认识也是在不断深化、发展的。国情可分为基本国情和一般国情。基本国情是指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一般国情是指处于一定社会性质下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国

① 张立文等主编.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23

际环境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及其特点的总和。国情还可以区分为自然国情与人文国情。所谓自然国情是指自然形成的,并在一定国度内客观存在的自然资源、地理环境和人口状况等国情的自然状况和特点的总和。自然国情的发展变化主要遵循自然界的法则或规律,而不以任何阶级、政党或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人文国情则是指由一定社会的人所组成的阶级、集团、政党的力量所形成的一定国度内客观存在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对外关系等方面的国家的基本状况及特点的总和。^①

“民俗”:民俗是一种具有传承性的社会文化现象,可以称之为民俗文化,它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与其他社会文化现象一样,也有其产生、发展、变化和消失的历史过程。我国清代学者黄遵宪在《民俗》一文中指出:“风俗之端始于甚微,搏之而无物,察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然而,一二人倡之,千百人和之。人与人相接,人与人相续,又踵而行之,及其至成。虽其极陋甚弊者,举国之人,习以为然。上智所不能察,大力所不能挽,严刑峻法所不能变。夫事有是非,有美有恶,旁观者或一览而知之,而被国称之为礼,沿之为俗。及至举国之人,辗转沿轂于其中,而莫能少越,则习之固人大矣。”一般来说,任何国家或民族的民俗都可以划分为三大类。一是物质生活之民俗,包括反映人们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生产所使用的生产工具、技术、工艺制作和衣食住行的各种习惯、仪式等。二是社会生活之民俗,包括人类共同体的组织、制度、习惯法、节日、岁时风俗、婚仪、丧葬习尚、竞技、游戏等。三是精神生活之民俗,包括巫

① 朱贤枚主编. 中国国情学.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20~26

术、占卜、宗教信仰、禁忌、民间文学等。^①

“中国特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及中国学者非常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国的政治、经济及各项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必须体现出“中国特色”,并且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长时期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那么,什么是“中国特色”?是不是只要是中国本土的思想、制度及文化都可以称为“中国特色”?如何处理坚持“中国特色”与“对外开放”“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优秀文明文化”的关系?许秀群在《中国国情、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关系探讨》一文中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就中国现代化来说,中国特色表现为人们在进行现代化建设实践时所表现出来的风格。按照毛泽东的理解,中国现代化的特色就是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气派”,或是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总蓝图中所显现出来的“中国风格”。虽然中国现代化特色形成带有中国特点的成分,但它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也不仅仅指中国现代化的特质,除了包容着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所具有的独特丰富个性外,中国特色还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即包括中国对其他国家现代化模式的有益成分的吸收和借鉴。邓小平正是抓住了中国特色的这一本质内容,对中国现代化的系列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思考,从而使其现代化理论具有较为明显的中国特色。在邓小平看来,中国现代化的特色主要表现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建立在借鉴和继承的基础上,遵循一定原则,按照一定途径所进行的创新,包括境界创新、思维创新、方法创新等,具体来说就是现代化建设要不唯书,不唯上,既要继承前人,又要

① 陈启新. 中国民俗学通论.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2~5

突破陈规,在开拓进取中创新;既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又要善于总结群众的经验,在提高升华中创新;既要在同中求异,又要在异中求同,在对立统一中创新;既要立足本国,又要放眼世界,在吸取借鉴中创新。^①

上述“文化”“传统”“国情”“民俗”“中国特色”等概念或全部或部分地包含了笔者所指的“民情”或“民情传统”的内涵,我们之所以没有沿用上述概念,是因为上述概念与我们所强调的“民情”在内涵及外延方面并不完全重合,或者过于宽泛,如“文化”“传统”,或者过于狭隘,如“国情”“民俗”“中国特色”。我们主要是从与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等)的关联度方面来界定“民情”的内涵和外延。我们认为“民情”就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在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地理环境和其他一些偶然事件影响下所形成的政治心态、思维定式、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等,以及民众的这种政治心态、思维定式、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对国家的制度演变及制度创新的促进或制约作用。

根据上述定义,“民情”首先是一个历史的形成过程,制度性因素、文化性因素、民族性因素、环境性因素及各种偶然因素都在“民情”形成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民情”形成过程中的制度性因素

在人类历史上,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的形成都是适应某种特殊需求的产物,即通过某种形式将特定区域内的人组织起来。一方面共同应对各种自然灾害和外部危机,另一方面消除区域内部

① 许秀群.中国国情、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关系探讨.广西大学梧州分校学报,2003(4)

不同个体之间的冲突和伤害,最大限度地保持部落或种族的延续。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区所出现的政治组织如国家,虽然其基本功能大体一致,但是具体的制度形式则存在很大的差异,中国、印度、埃及等东方国家最初的政治制度大都表现为以一个人为核心的专制或独裁形式,在专制或独裁的政治制度之下,东方国家逐渐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民情传统,而这种传统反过来又成为专制制度存在和延续的民情基础。特别是,由于地理位置的相对封闭和儒家伦理强大的宣传教化作用,2000多年来中国社会一直走不出这种循循相因的历史怪圈。而在欧洲的希腊地区则出现了多种政治制度(如君主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寡头政体、僭主政体等),其中,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城邦以其强大的政治及军事优势使他们的政治制度——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不仅为其他大多数希腊城邦所仿效,而且对后来的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中世纪时期的日耳曼国家乃至近代西欧各国的政治制度均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由此也逐渐塑造出与东方专制下完全不同的民情传统。

二、“民情”形成过程中的文化性因素

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是分别产生于东西方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两种文化在东西方社会的形成和演变都经历了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在两种不同文化的浸润之下,中国与欧洲的民情传统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近代中国所经历的种种政治挫折和思想振荡,使得当代中国学者对中西方民情传统的差异性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有学者将这种差异形容为魅力与魔力的差异。在自然观方面,西方人认为,“空间存在的一切都是可分的、孤立的、对立的。人也是孤立的个体的存在,人是自足的,人是自利的

的。但同时,人又是独立的,有自己的尊严,人与自然界各自分立,人要对大自然探索、认知、征服。以此为基础,西方文化显示了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文化特征,并以科学为文化导向。”“中国先哲认为,天地间的人和物、人和人、物和物,都是有机的联系而不可分割的。单个的物不能孤立存在,单个的人不能独立生存。以此为根基,中国文化显示了整体主义与道德理想主义的文化特征,并以伦理为文化导向。”在认识论方面,“西方文化的魔力,表现在对事物的认识上,不是整体的观察思考,而是偏重于个体分析、逻辑推理,表现为片面的掘进。西方哲学家、思想家不一定对某一事物作出整体、全面的研究,仅考察其问题的一个方面,仅靠执其一端即可创立一种理论,提出一种学术观点,建立一种学说。甚至发展成为一个学派,形成一个主义。”“与西方的文化魔力不同的是,中国的哲学思想则具有一种内在的、持久的魅力。中国的哲学家偏重于对事物的整体思考,再加上独特的悟性和体验,由之而产生的哲学思想则具有深刻的哲理。它深奥、博大、精深,认识越久越感到其深邃、永无止境,难以跳出这个圈子;同时,也难以标新立异,创立新的理论、主义了。”^①

三、“民情”形成过程中的民族性因素

所谓民族性主要是指民族心理及其由民族心理构成的民族性格、民族风采和民族风格,民族性是贯穿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性的东西。民族性无疑是通过一个个民族成员的人格特点得到表现,却不是一个个个人格的相加,它已经是以作为民族这种

① 董广杰,李露亮.魅力与魔力——中西文化透视.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9:2~4

群体整体的面貌出现的,通达历史和社会的各个方面。侯晓艳的一篇文章为我们理解中西方的民族性差异与民情传统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在该文中,她通过分析中国和古希腊的神话人物来揭示古代中国与希腊人在民族性格方面的差异。她认为,无论是中华民族,还是古希腊民族,其神话中都有不少英雄传说,而这些传说中有两类英雄值得我们注意:一类是不畏艰辛,征服自然的英雄;另一类是不怕牺牲,征战异族的英雄。这两类神话英雄之所以称其为英雄,就在于他们都具有为达目的不惜赴汤蹈火、死而后已的大无畏精神,都建立了为人所称道的丰功伟绩。这表明两大民族在崇尚文治武功方面没什么两样。但如果我们细细考察这些英雄建功立业的具体行为时,便会发现两大民族实际上存在着很多不同。首先,神话英雄们的行为动机不同。就中国古代神话而言,无论是女娲、神农,还是盘古、燧人、鲧、禹,他们之所以费尽心机、历尽艰险,无不是为了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他们没有半点儿私心杂念,其行为动机都是高尚的。古希腊的神话英雄们几乎都是一些追求功名的利己英雄,他们多半是为了满足个人对生命价值的追求才甘冒生命危险的。上述神话英雄的行为动机反映了两大古老民族在精神上的一个核心差别,即古代的中国人崇尚利他,希腊人追求利己。而且,在此过程中,还表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中国的神话英雄都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希腊的神话英雄们则贪杯好色、追求享乐。其次,神话英雄们的行为方式各异。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可以说响彻了劳动的回音,神话英雄们的英雄业绩几乎都是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上的;而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们就不一样了,他们所追求的财产、权利、荣誉和爱情等都不是靠脚踏实地的劳动去创造、去获得,而是靠冒险、武力和狡黠去攫取、去征服。再次,

神话英雄们的行为结果也不一样。中国的神话英雄由于其所作所为都是为民造福,而且在此过程中他们都竭尽所能、无私奉献,因此,他们最终几乎都功成名就,成为了某种美德和理想的化身,受到世世代代人民的敬仰和爱戴,古希腊的神话英雄则由于追求的是个人欲望的满足,而且为此不择手段、不顾一切,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尽管一度有所收获,但终因贪得无厌,最后不仅得不偿失,而且结局悲惨。^①

四、“民情”形成过程中的环境因素

古代社会,地理环境是决定生存的主要因素之一。中国位于欧亚非大地块的东缘,西边有一系列巨大的山脉与沙漠形成一道天然屏障,将其与地块以西诸文明隔开。加上东南部面临浩瀚的太平洋,这虽不是面徒四壁的全封闭环境,但的确也是网开一面的准封闭形势。这里河流众多,黄河长江又挈百川之首,汉民族生育于此。水既是农业生产的一个基本条件,但又经常造成灾害。西高东低的地势,使常常泛滥的黄河异常凶猛。治水的事例在古书、神话中都有记载:人类洪荒时代,大雨了无终日,女娲炼石补天,“汤汤洪水滔天,浩浩坏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为了治水,人们不得不联合起来,这造成两个结果:一是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难以分化,二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宗法制度。面对水灾,个人是无能为力的,必须动员全氏族的成员,他们基于共同的命运、血缘关系也能联合起来。治水要有一定的经验,这只有长期进行才能取得,年长且较有经验的治水有功者往往成为氏族领

① 侯晓艳. 从神话英雄行为看中国和希腊民族性格的不同. 宜宾学院学报, 2003(5)

袖,同时也是氏族中的长老。具有血缘的成员之间的关系靠个人的道德自觉、习惯、风俗维持,不能诉诸强力,即便有冲突,一方面要隐忍,一方面要由长老调解裁决。长老是氏族社会中的权威,这依据的是他在氏族中的年龄、辈分,因为在那时年龄、辈分就是经验、能力的标志。因此宗族制与血缘彼此融合,将社会成员牢固地维系在一起,借以克服由单独个体所不能克服的困难,并承受由单独个体所不能承受的压力。既然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只能生活在无数大小不等的血缘群体中而不是以独立个体的形式存在,那么无论是对内联合,还是对外抗御,保持这一群体的凝聚力就显得格外重要。而以族长、家长为核心的向心模式,正是这种内在要求的必然结果,用道德和法规的形式来确定族长、家长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样成为必然,其结果就是人们随之形成的以家长为权力中心的向心意识。

古希腊多山地,少平原,多面滨海,无黄河那样的河流,靠渔猎、放牧为生,即使碰到一些自然灾害(如地震、火山爆发),可以逃离他方继续渔猎、放牧,凭个人的力量即可生存。地中海连接欧、亚、非三大洲,这里开阔的地貌适宜放牧。游牧部落随季节自由地驰骋于三大洲。因此,面对生存的困境,他们不是太被动——不与自然灾害抗争就只有灭亡,而是可以趋利避害,选择较适宜的生存地域。在这一过程中,自然地产生出与自然抗争的信心——生存的主动性:既能客观地认识自然,又能正确地省视人自身,这本身即是一种与自然抗争有效的方法。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他们可以利用自然界一切可能的生存条件作为谋生方式,由此形成多种行业。行业之间互通有无,为双方生存提供更多物品,相对而言彼此生存保障增大。这种依赖关系是以每一单独的个体有能力生存为前提,以分工、地域交易(市场)为纽带的。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组合是因为个人利益,而非血缘。交往的广泛性本身要有个体的独立性,反过来又促进交往的广泛性。这样,各群体在劳动中创造的文化(语言、工业、工艺、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得到了交流、互补、促进。也正因为个体的独立性和交往的广泛性,摩擦冲突就多,导致战争频发。但战争不完全是为了通过人口、土地的增殖来维持生存,除非为了更快、更简捷地获取财富和获得尊严。频繁战争说明谁也难以征服谁而一统天下,由此而产生了独立生存的信心、自由意识和地理上迁徙的便利(海的阻隔),这给文化的交流、繁荣留下了余地。

如上所述,民情的形成、变化和沿革是各种因素综合影响的产物,但是逐步形成或相对稳定的民情传统也必然会对社会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的延续和变革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力。民情是制度规范的注脚,它通过对法律的解释来排斥、缩小和曲解不为自己所认可的部分,制度效能只有见诸于人才会实现,它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它对制度的主客体(执行者与服从者)的要求与一定习俗制约下所能提供的人的能力和特点之间差距的大小。制度与人之间允许存在一定的张力,一般的原则是,制度规范的要求可以在人们普遍的行为习惯、准则和能力的平均线上上下下波动,过高或过低的要求都会因缺乏现实可能性受到人们实际行为能力和特点的限制,或名不副实,或名存实亡,发生变形。

一种制度不仅是一套法律文本,它还是一套规范体系,新制度的实现过程就是一种新的民情传统的培养和形成过程。当新制度规范与人们普遍的行为水平和习性大体一致时,其推行也易,传播也快,合法性程度也愈高。反之,“即使是完善的法律制度,而且为民众所赞同,要是公民的情操尚未经习俗和教化陶冶而符合于政体的基本精神——要是城邦订立了平民法制,而公民